

中国人的 人性

外国人写中国人的一本好书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
鲁迅先生力荐“立此存照”的惊世之作

〔美〕阿瑟·亨德森·史密斯/著
姚锦镛/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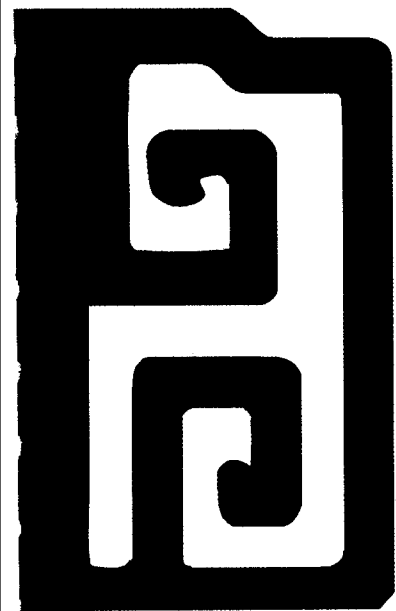


中国人的 人性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阿瑟·亨德森·史密斯 / 著
姚锦镛 /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人性：图文版 / (美)阿瑟·亨德森·史密斯著，
姚锦镛译.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9

ISBN 7-80201-499-9

I. 中… II. ①阿…②姚… III. 民族性—中国—文集

IV. C95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3224 号

中国人的人性

原 著：阿瑟·亨德森·史密斯

译 者：姚锦镛

责任编辑：李 路

整体设计：子 木

文字编辑：黎 娜

美术编辑：许晓晨

设计总监：子 木

出版发行 中国和平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154 号
邮 政 编 码 100009
发 行 部 (010) 84026161 84026019
网 址 www.hp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2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1-499-9/G · 376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即《中国人的人性》)来，把这本书当成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立此存照”（三）》



译本序

本书作者阿瑟·亨德森·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中文名为明恩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 22岁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 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 时年27岁的史密斯来到中国, 先后在天津、山东、河北等地传教, 并参加当地的救灾、医疗等工作, 在中国居留50余年之久。他根据自身在中国的经历, 先后写了《中国的格言与谚语》、《中国人的人性》、《中国的农村生活》、《骚动的中国》等书。

1906年史密斯回美国为教会募捐, 在美国各地奔走演讲。同年, 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 退还庚子赔款, 用在有益于中国的事业上, 特别是提供给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之用, 得到总统支持, 庚款退还的议案得以在国会顺利通过, 为中国办了一件好事。

《中国人的人性》一书是史密斯的代表作。1890年, 他根据自己在中国传教22年中观察、体验所积累起的生活经验, 以“中国人的人性”为总题, 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中国北方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中国和东方广为传布, 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人们纷纷要求作者结集成书。《中国人的人性》一书于1894年由美国佛莱明公司在纽约出版。

世界上的民族固然不能有“优”、“劣”之分, 但也没有哪个民族自称是十全十美的。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人民的勤劳、聪明世所公认, 但也因长期受封建制度的统治, 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存在

不少消极、保守的性格特征，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尤其到了清王朝的末期，国弱民穷，备受外国列强的欺凌。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外来列强的大炮轰开，西方思想传入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民族危机，纷纷寻求救国之道。有主张文化创造的，有提倡西化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正视我们这个民族“劣根性”的却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史密斯的《中国人的人性》一书应运而生，不但为外国，也为我们中国人打开一个窗口，提供一面镜子，使我们认真严肃地看看我们中华民族到底染上什么疾病，病根何在。

应该说，史密斯写作《中国人的人性》的态度是公正而诚实的，书中所反映的内容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史密斯凭着自己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验，公正而客观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民具有的突出优点——勤劳、节俭、生命力强等，同时也指出中国人的性格中存在的消极、保守等缺陷，如爱面子、缺乏时间观念、抱残守缺、缺乏公共精神等等的性格特征；揭示了清政府的封建政体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如官员的无能和热衷于敲诈勒索，行政管理能力的低下，上下级之间的相互猜疑等等腐败现象；描述了民众迷信落后的风俗习惯。作者对统治中国思想界数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作了中肯而全面的评价。不过，由于他毕竟是个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肤浅，他的许多见解，不但现在看来失之幼稚，在当时也不见得十分高明和深刻，尤其是他所开出的救中国的“药方”，历史证明无非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而且有意无意间流露出殖民者居高临下的架势，尤其对造成民众贫穷和愚昧的原因、太平天国起义等的评价，很不客观，想来读者对此一眼就可看出。

《中国人的人性》（旧译作《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格》）一



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重视。鲁迅、潘光旦、李景汉、费正清等先生先后发表文章予以介绍，评价很高。特别是鲁迅先生，早在他日本留学期间，就以极大的兴趣研读本书，在如何改造中国国民性方面受到史密斯的重要影响。后来，鲁迅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了《中国人的人性》一书。特别是1936年，先生逝世十四天前，在《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上，语重心长地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是中国人。”潘光旦先生在他所著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的自序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人的人性》。他指出，史密斯“和中国的关系，既如其长久而密切，观察所及，当不至于过于浮泛……”潘先生说他的书中“所历叙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但是一个事实，为明氏（指明恩溥，H·史密斯的中文名——译者）一般明眼人所见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学理而言之，也确乎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费正清先生1985年12月在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讲话里也说：“美国人心目中的映像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著作来加以完成的，即明恩溥牧师所著的《中国人的人性》……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差别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明恩溥把作为文化差异的‘贫穷’与‘社会团结’，写得特别精彩。”

史密斯说：“中国人并不缺智慧，不缺忍耐、务实和乐天的性格。在这些方面，他们都非常出色。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不待言，史密斯所说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今天的中国已非当年



的中国，今天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早已焕然一新。我们之所以还把这本书介绍给读者，无非是想让各位看看我们的先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生活的，他们身上压着多么沉重的精神锁链，多多少少起点“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吧；同时，我们也不能说，现在我们已不存在史氏所公正指出的那些消极的性格和现象了。且看看当今社会上那些见死不救的看客，看看那些图财害命的奸商、那些营私舞弊的贪官，看看那些封建迷信活动、那些不文明的行为……再对照《中国人的人性》所反映出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省和羞愧吗？

姚锦容

2006年于浙江大学



引言

但凡要知情人站出来作证，人们无不指望他能实话实说，唯一的要求是把真实情况和盘托出。不少人对中国有所了解，他们也道出了一些真情，然而能做到只讲真情的人也许为数寥寥，而能讲出全部真情实况者至今没有一个。任凭他学识多么渊博，谁也不可能说得清中国的全部真实情况。因此，本书不免首先要对三种不同的观点讲几句。

首先，据说要想对人说清中国人的性格特征，这种企图终属枉然。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沃格洛夫·柯克先生^①在1857—1858年期间，像当时其他作家一样，有机会亲眼目睹了生活在种种不同环境下的中国人，并在一些训练有素的人们的帮助下，通过他们的眼睛透彻了解中国人。然而，柯克先生在其出版的书信集的序言中说了以下一段话，为其未能充分描述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而耿耿于怀：“在这些信件中，我没有把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细致地写出来。这是一大疏忽。这原本是个最引人入胜的课题，可提供最大的空间以发挥极富创造力的假设，作深入的概括，并得出圆满的判断。任凭谁，尽管他多么微不足道，都可能因为我没有利用这些机会而有所作为而加以挑剔，非议我。事实是，我已写过中华民族整体上的一些优秀品质，但不幸的是，在我写作过程中同时又看到该民族的人言行粗鲁失礼，有违我最初的设想，为真实计，我先后烧毁了其中几封信。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经常跟几位杰出而坦诚的汉学家谈及此事，看出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观点，同样认为不可能用一个概念来概况中国人整体的性格特征。不过只有那些对中国人有透彻了解的人才遇到这些难题。而对一般精明的人来说，他们尽管对这方面一窍不通，却能轻易写出分析文章来，写得虽然精彩而哗众取宠，但缺少的恰恰是真实。有朝一日，我们也许终能获得必要的知识，洞识中国人那些微妙的矛盾心理，评价它们在总体中国人中的分量和影响力。时至今日，有一点至少是令人满意的，那就

^①柯克(1814—1865):英国律师兼新闻记者。1857年来华，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



是我在描述中国佬^①时，避免使用严格的定义，而是突出他们一些最为人所瞩目的品质。”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人在许多地区事务中已扮演一定的角色。可以看出，他们不畏惧压力；也可以感到，他们难以为人所理解。确实，要正确理解中国人，只有身在中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然而，人们普遍的印象是：中国人是个无法理解的矛盾体。但是毕竟还是找不到明显的理由说明：既然我们与中国人打过几百年的交道，为什么始终不能像解释其它种种复杂的现象那样，说得明、理得清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还有一种观点，对本书更抱反对态度，认为本书作者不具备撰写本书的资格。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的人未必有能力写出中国人性格特征的书，就像在银矿下干了二十二年活的人，并不足以证明他能写出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的著作。中国幅员辽阔，谁要是没有去过其一半以上的省份，而只是在两个省份生活过，他自然没有资格总结这个帝国。书中的这些文字原本是写给《字林西报》^②的，无意在更大范围传播。但是有些话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大不列颠、美国和加拿大引起很大的兴趣，要求作者结集成书。^③

第三种不同的观点认为，书中涉及的一些看法，特别是中国人道德伦理方面的特征，起着误导作用，失之偏颇。

然而请不要忘记，印象并不属于统计学范畴，不可能做到方方面面都正确无误。印象如同照片的底片，没有两张底片是完全相同的，但两张底片都分别真实地反映出其他底片无法反映出的内容。选用的胶片不同，镜头不一样，采用的冲洗方法有殊，最终得到的自然是两样的照片。

不少人在中国生活多年，比笔者更了解中国，他们所表达出的观点实质上与笔者是一致的。还有一些人认为，应该给过于单调的画面抹上几许亮色，以增添其真实度。这些人也同样值得尊重。正因为考虑到这些正确的意见，本书已作了彻底的修订。鉴于本书重版时间紧迫，原先有关中国人性格问题的三分之一内容只得忍痛割爱，而保留下来的内容却是最重要的，并新增了《知足常乐》一章。

①令人吃惊而更为遗憾的是，中国佬 (a Chinaman) 这个野蛮的称谓看来已在英语中扎根，而不用中国人 (Chinese) 这个恰当的词。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在华出版的外国杂志不用这个词，也没有发现这个帝国的任何一个作家坚持避免使用这个词。——作者原注。

②《字林西报》是当时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影响力很大的英文报纸。

③《中国人的人性》于1890年在上海出版。本书在中国和东方广为传播。——作者原注。



中国人具有、并已显示出许多优良品德，没有任何理由对此视而不见，而不加赞美；同样，也不能有先入之见，或过高赞誉中国人的道德实践，其危险无异于一味贬低其价值。这不禁令人想起萨克雷^①。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中好人总是笨头笨脑，而坏人都很聪明，这位伟大的讽刺家回答说，他可是个有眼无心的人。一幅描绘橡树的木刻画，要求观赏者透过树的轮廓看到拿破仑低头双手抱臂站在圣赫勒拿岛^②时的侧身像。长时间驻足观看往往一无所获，想来其中有诈，但是经人指点之后，完全有可能看到拿破仑了。同样的道理，中国的许多情况最初没有被你发现，但一旦看见了便会牢记不忘。

虽然并非每个完整的句子都要加上限制性的从句，需要明白提醒读者，本书无意概括整个帝国，也不想对外国人的所见所闻和所经历作全面的概括。这些文字只是表达一位观察者的印象，记录众多“中国人性格特征”中的一个部分罢了。它们并不是中国人的整体画像，而只是一位观察者把所见到的用炭笔粗略勾画出中国人的某些性格的素描而已。无数条光汇聚一起，形成一条完整的光束。这些文字也可以看作是入门读物，其中许多细节不但来自笔者自身的经验，也汇集了各种各样其他人不同时期的经历。正因为此，该课题才有那么多的例证。

密迪乐先生^③是众多研究中国和中国人学者中最具哲理的作家，他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向他人介绍别的民族精神的最好办法是请他阅读一些笔记，其中仔细记录有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特别是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件，并有该国国民所作的一些专门的解释。

从大量丰富的事例中可以推导出一般性的原则。这些原则可以怀疑，也可以否定，但引用的例子只要是真实的，就不能由于某一原因便弃之不顾，任何有关中国人特征的理论均必须认真加以考虑。

有志于比较中国人与盎格鲁-萨克逊的人都会强烈地感觉得这是一件艰难的研究工作，并且很快就会发现，许多看似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其实只是东方人的特征，但是到底有多大程度是正确的，请读者诸君根据自身的

① 萨克雷 (1811-1863)：英国著名作家，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名利场》，用辛辣的讽刺手法揭露出当时英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丑恶和不公现象。

② 圣赫勒拿岛 (St. Helena)：南大西洋岛屿，1815-1821 年拿破仑一世被放逐于此并死于此。

③ 密迪乐 (1815-1868) 先后曾任英国驻广州、上海、宁波等地领事馆翻译，著有《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中国语言等的杂录》、《中国人及其叛乱》等书。



经历各自作出判断。

据说，现今我们在与中国人交往过程中，可以通过三条途径来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研读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三种信息来源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同时还有第四条来源，这一条比起前三条的总和还更有价值，那就是在中国人家里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但并非每位撰写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作者都能通达这一途径。比起城市来，在农村更容易搞清一个地区的地形地貌，同样，在家庭里更容易明白中国人的特征。外国人可以在城市里生活十年，但所了解到的中国人的家庭知识远不如在农村里生活一年收获大。除了家庭，农村也应该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因此，本书中的文章都是以一个中国农村作立脚点写成的。这些文字无意宣扬传教士的观点，其宗旨是表达一位不带任何主观偏见的观察者的所见所闻。基于此，本书决不涉及诸如用基督教改造中国人品德的文字，根本也没提到中国人需要基督教。若是书中说到有关中国人性格的重大缺陷，那么如何纠正这些缺陷不能不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提出这一问题也是公正的。

如前所述，“中国人的问题”现在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比起现在来，到了20世纪，这个问题将显得越发紧迫。中国人口占有整个人类很大的比例，但凡对人类抱有良好愿望的人无不关注如何使这部分人得到发展。如果说上述的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定会得到许多论据的支持——这些论据此前却被大大地忽视了；如果这些结论是错的，尽管得到过多大的支持，到头来也会不攻自破。

埃尔金勋爵^①曾就上海商界对一件事作过答复，这虽是好多年前的事，但他的话现在听来还是正确而中肯的。“当妨碍通向这个国家腹地自由的障碍被排除后，西方基督文明将面临着不是野蛮，而是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衰败和缺陷的古老文明，同时另一些方面又值得我们同情和尊重。在今后的竞争中，基督文明想要在这多疑而智慧的人民中找到一条路径，那就要人们相信，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公众的道德，升入天国的信仰比待在尘世的信仰更有保障。”

^①埃尔金勋爵(1811—1863):英国外交官。1857年和1859年分别担任过英国侵华军全权代表，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和《中英北京条约》。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面子问题	1
第二章 节约持家	4
第三章 勤劳刻苦	10
第四章 礼节	16
第五章 缺乏时间观念	21
第六章 忽视精确	26
第七章 天性误解	33
第八章 拐弯抹角	38
第九章 柔顺固执	43
第十章 心智混乱	48
第十一章 麻木不仁	54
第十二章 蔑视外国人	60
第十三章 缺乏公心	66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72
第十五章 不讲究舒适和方便	78
第十六章 生命力	91
第十七章 忍耐和执著	97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105



第十九章 孝道	111
第二十章 仁慈行善	121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心	127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暴	141
第二十三章 相互责任和遵制守法	148
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158
第二十五章 诚信的缺失	174
第二十六章 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	188
第二十七章 现状与需要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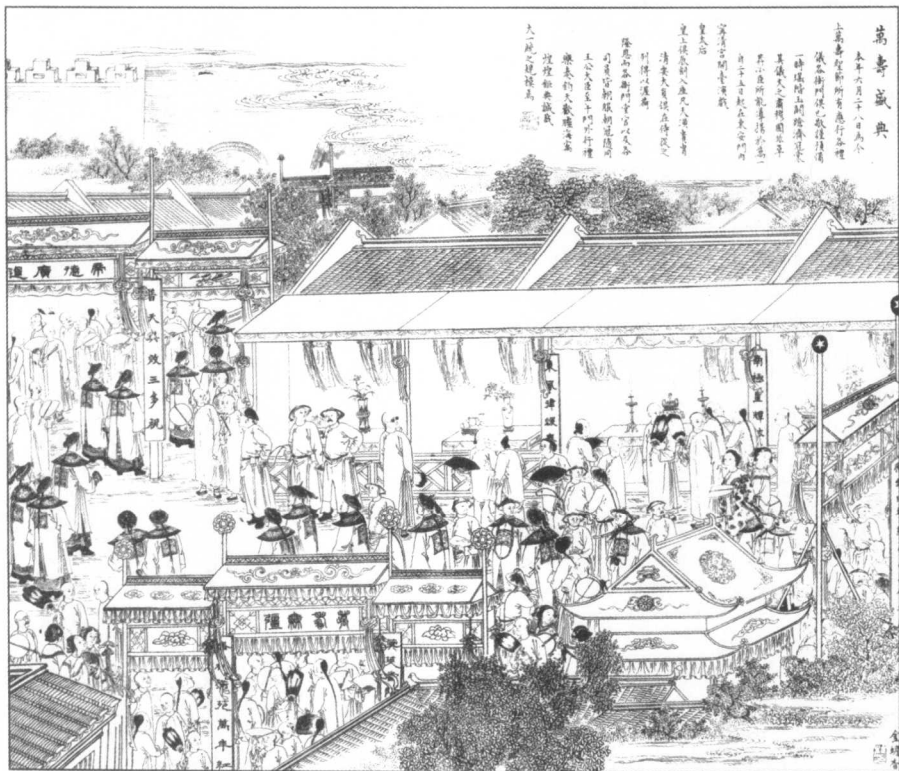


第一章

面子问题

“面子”是人类共有的问题。乍看起来，把“面子”看成是中国人的特性最荒唐不过了。但是“面子”一词在中国不单指的是人的脸面，它的含义复杂多样，比我们所描述的、所理解的还要丰富。

哪怕不是全面地理解“面子”的意义，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这么一个事实：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天生富有很强的表演才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这一民族唯一的全民性娱乐。中国人对戏剧的热情，不亚于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稍加刺激，中国人就自比戏剧中的一个角色，就要投身剧情之中，行起礼来，翻身下跪，叩头触地。西方人看到这种情况，即使不觉得荒谬可笑，也认为多此一举。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是戏剧性的。一旦尊严被激发出来，即使面对的是三两人，也觉得自己在大庭广众演说，他会高声说：“我在对你，也对你，也对你，对在场的各位说。”他的麻烦一旦得到解决，便在赞许声中“下了台”；如果得不到解决，就觉得自己无法“下台”。要是你搞明白了，就知道这一切原来与现实毫无关系，始终不是事实，事关形式而已。如果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发表了精彩的演说，不啻演了一台好戏。我们不必去幕后，否则就要破坏世间的所有好戏。也许诸如此类的与种种复杂生活相关的戏剧性的行动，便是面



万寿盛典 《点石斋画报》

皇帝寿典的排场关系到清廷的面子问题，即使风雨飘摇的清末，也极尽铺张。

子。若不这样做，忘了去做，打断他们的表演，那就是丢了“面子”。一旦确切地理解了这问题，那就发现原来“面子”是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征这把暗码锁。

需要补充的是，“面子”的运作规则以及如何保住“面子”的功夫是西方人完全不得要领的，因为他们始终忘了其间的戏剧要素，而误入与其无关的讲求事实的歧途。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面子”就像南洋诸岛上的禁忌，是一种不容否定的潜在力量，所不同的是：“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废除或替换全由人们的常识来定。在这点上中国人和西方人必须达成共识，承认彼此存在差异，因为他们在相同的情况下对同一事物永远不能达到一致的观点。如果说欧洲的政客在调解过程中时刻考虑到力量平



衡的问题，那么在中国，调解乡村无休止的争端时，“和事佬”也要务必仔细考虑双方“面子”平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调解的目的不是实现公正——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是为了公正——但对东方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调解之举只是为了平衡有关各方相应的“面子”。这一原则在法律裁决中也常常得到运用，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不分胜负的游戏。

送人一份厚礼便是给人“面子”。如果礼物是个人送的，那只能收下部分礼物，鲜有，或者说从来没有全部拒收之事发生。不妨举几个例子，足以说明人们是多么渴望保住“面子”。被人指出犯了错误是丢“面子”，务必要掩过饰非，不管证据有多充分，保住“面子”要紧。有人丢了一只网球，不只是怀疑，而且有证可查，是被一名帮工捡了去。该帮工怒气冲冲予以否认，然后去了丢球的地方，很快就找到网球（球是从他的袖管里掉出来的），他说：“你的球就在这儿。”一位女佣人偷偷地把客人的削笔刀藏在主人的房间里，后来在台布下又“找到”了小刀，并装模作样地把刀子交了出去。上述两人从而都保住了“面子”。有名仆人不小心丢了一把银勺子，他知道这是要赔的，要不就从工钱里扣，于是主动提出辞职，并故作清高地说：“那钱就留作抵银勺得了，我不要了。”他就这样没伤着自己的“面子”。有位债主明知道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也要跑到欠债人那儿，狠狠地训了对方一顿，摆出一副架势，表明自己有办法对付。他没有要回钱，却保住了“面子”，从而保障了自己今后不会碰到要不回钱的局面。有个仆人失职，还拒绝履行自己的职务。他知道这下要被辞退，便把犯过的错误再犯一次，然后主动提出辞工，以此保住自己的“面子”。

命可以不要，“面子”非保住不可，对此我们并不欣赏。我们听说有这么一位中国县官犯了杀头的死罪，但得了特殊的关照，允许他可以穿着官服上刑场，这就给了他一个“面子”。